

亚基督形象再世的意味

——再论《断头台》中阿夫季形象的宗教意义

Revival of the Christ Image & Hope of His
Return: Religious Meaning of Afuji,
the Hero of *The Guillotine*

常江虹 广东惠州学院

Chang Jianghong, Huizhou College

[Abstract] The literary world was astir with mixed reactions to *The Guillotine*, a novel by Aitmatov of the Soviet Union, when it was published in the 1980s. Afuji, the hero of the novel is widely seen as the icon of the idealized Christian saint.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a character study of the hero, the author analyzes Aitmatov's religious thought in light of Christian culture. He concludes that the hero not only expresses the writer's eschatological hope for redemption in the end times, but also reveals his doubts that this hope could be realized. Aitmatov's conflicting sentiments, the author surmises, arises from his atheistic background, where Christ's resurrection has been demythologized through the prism of reason and ethics, and his eschatology colored by Russian Orthodox Christianity.

The Guillotine, a novel by Aitmatov of the Soviet Union, has evoked

worldwide repercussions and has different praise and blame since 1980's. The hero of the novel has been widely seen as an idealized Christianity saint. This article,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original text about this character, analyses Aitmatov's thought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religion culture. It believes that this hero not only expresses the writer's hope to save the religious expectation of the latter part, but also shows his doubt of religious effect in reality. It suggests that the source lies in the writer's thought according to the atheism on a rational turn, the resurrection view and the Russian archimandrite cultural backgrounds that morals turn under of the Christian judgment day theory.

前苏联作家钦·艾特玛托夫上个世纪 80 年代描写现代社会问题的长篇小说《断头台》，线索多重，意象多元。在这部由多个叙事单元并置交错、对比映照而布局结构的文学作品中，阿夫季这一形象占据了大部分篇幅的中心位置。就笔者所了解到的国内相关评论而言，不少人对这一形象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就像小说里的毒贩头子格里尚的讥讽——“新一代的耶稣”。笔者在研读文本的基础上，着重对作家通过人物刻画所透示出的宗教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思考辨析，由此在人物的基本评价上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

小说前两部的主人公阿夫季原是神学院的学生，因公然“离经叛道”被开除，成了一个无固定职业和经济来源的流浪者，这一身份特点与俄罗斯文化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精神流浪者相吻合，

其特立独行、不合时宜的思想言行亦与俄国特有的“圣愚”文化现象相似。但“精神不正常”、“不折不扣的丧失理智的宗教狂”、“鬼迷心窍的白痴阶层”等，均出自毒贩头子的咒骂，严格说来，阿夫季并不全然符合圣愚的一般特征，即使按照美国学者汤普逊所定义的相当宽泛的“程式化圣愚”^①加以衡量。因为他并非“倾向于选择无所依傍、避免长期效力某事的道路”，^②其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除了精神自由之外还负有社会拯救的使命感、危机感，可以说是一个坚定的“编外”、“业余”的神职人员，时时处处都在对众人尤其是对罪人宣讲上帝的福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从小说对其生活方式和行为命运的描写来看，堪称是一位现代圣徒。当然，在那些利欲熏心的现代市侩眼中，此人的确是“为了基督而愚痴”。

小说开头叙述他离校后，在报社谋取了一份编外人员的差使，就想开一个思想专栏，“就当代所谓上帝和人的问题阐发一系列极其迫切、极其重要、并且按照他的信念堪称独树一帜的见解，以反对古老的神学中教条式的公理”。对此，作家评道：“他的企图十分可笑，因为在他面前矗立着两座绝对无法攻克和摧毁的堡垒，……一方是不受时间左右、千年不变的耶稣复活观念，……另一方则是彻底否定宗教的科学无神论的强大逻辑。”这个“不幸的革新者，处于两者之间，犹如夹在两片磨盘之间。”^③接着，小说在第一部里通过两场对话的重头戏表现了这“两座坚固的堡垒”。

第一场对话是阿夫季回忆当年在神学院时与教区督导季米特里神父之间关于上帝问题的辩论。年少气盛的他认为一切思想观

① [美]汤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杨德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205页、第235页。

② 同上。

③ 钦·艾特玛托夫，《断头台》，曹国维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38页。

念都在演变发展,上帝同样应当具有发展的属性,应当“摆脱教条的桎梏,让人的精神在认识上帝即是认识生存的最高本质中,享有充分的自由”。神父驳道:“永恒的造物主不是我们人力所能认识的。他存在于我们之外”,“教条是上帝的恩赐”,“教条主义是所有规章制度、所有权力系统的首要支柱”。阿夫季说:“在我们的意识之外,没有上帝”,“我的教会就是我自己”。神父讥道:“你以为上帝只是你想象的产物”,“你想让自己替代上帝”。^①表面上神父所持观点近似于否定神学,但显然骨子里要维护的与其说是某种神学观念,不如说是由观念和话语确立其合法性的官方教会体制和权力。有学者认为这一人物“是一个缺乏真实性的、虚构的角色而已”,缘于作为吉尔吉斯人的作家受特定时期主流话语影响未能客观正确地认识俄国教会及历史;而阿夫季的宗教言论和认识则是“极其客观、理性的”,虽然作品把他描写成一个基督徒;因而小说反映了作家本人的理性思辨和矛盾悖论:把改造社会的理想寄托于宗教精神的 20 世纪俄罗斯无神论者的典型特征。^②阿夫季在辩论中总体上表述了两个要点:上帝在每个人的心中,宗教应对现实人生有所裨益,其中不乏将神学个体化、主观化的倾向。这场对话表现了神学内部的分歧,教会体系的外部神学观和个体心灵的内在神学观的交锋。

在经历和体验了神父的预言“世俗生活将使你学会服从,因为那里为了糊口首先需要替自己挣一块面包”^③之后,阿夫季虽然没有“学会服从”,但却实实在在地知道了世俗与天国、金钱与上帝

① 钦·艾特玛托夫,《断头台》,曹国维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 89 页。

② 金亚娜等著,《充盈的虚无——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 387 页。

③ 钦·艾特玛托夫,《断头台》,曹国维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 90 页。

在世人那里的水火不容,这体现为他与格里尚的鲜明对峙。这一场世俗和神学的对话实际上延续和验证着上一场对话:要对人们的心灵和生活产生作用的神学在现实中的实际处境。“我到上帝那儿有自己的路,……走后门。我帮助人们体验幸福,在吸毒中认识上帝”。“世界上一切都可以买卖,包括你的上帝在内。我至少可以让人们在吸毒中享受一下你们口头上许诺的、但要到来世才能得到的幸福”。^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伊凡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可以做”。没有信仰的现代人不但为所欲为,而且可以用一切取代上帝,甚至毒品,这不过是为极端的个人享乐主义找一个开脱。

面对这些恬不知耻的振振有词,阿夫季的话语显得苍白无力,他只能指出这种幻觉中的幸福不过是“自我欺骗”。言辞交锋之后,格里尚为了证实自己的“真理”,允许对手留在毒贩中间,让这个“大救世主”试试去“拯救他们的灵魂吧”。如果人们接受基督的福音,那他就认输滚蛋。这个赌赛很容量让人想起《浮士德》,也容易具象化地想起“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革命领袖话语。当孤身奋斗的阿夫季感到语言乏力,亦即从诱惑和“麻醉”的功效而言宗教远不及毒品时,就以扬弃自己辛苦采集的大麻——成百上千的卢布的行动试图震撼实则震怒了毒贩,歹徒们残忍地把这个疯子、异类踢下疾驰的火车。他们压根就不是同路人,代表上帝观念的新一代的救世主被代表魔鬼的成群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者们扔出时代生活的列车。别说输赢,连命也差点儿搭上。无情的事实残酷地验证了格里尚的结论:“各各他事件之前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到今天,人还是那样的人。人的内心从那时以来没有丝

^① 钦·艾特玛托夫,《断头台》,曹国维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136页。

毫的变化”。^①

二

小说中阿夫季两次去了莫云库姆草原。第一次是为了报道社会吸毒现象有意混迹于毒贩中间,如若仅仅完成报社的任务而非念念不忘于“布道”,就不会有性命之虞(这篇几乎是用生命为代价的采访报道终因触及社会阴暗面未能面世)。二进草原,纯属偶然。起因是为头次邂逅的女人再到中亚,对方因故爽约,为了赚点费用他才又一次“搭错车”。阿夫季的所有经历和思想,都是以此次遭难末日来临之际的回忆和幻觉引出或展开的。当他阻挠围猎野生动物被人捆绑扔在卡车上成堆的羚羊尸体中间时,作家运用现代主义手法,借助人物的意识活动描写了一大段耶稣与本丢·彼拉多的对话。这个超越时空的重要历史情景的艺术再现,又可说是在前两场对话及情节发展基础上的对照呼应,是关于历史与现代、宗教与生活的沉重思考。

自称“不信你们的教义”却虑及来世的彼拉多询问耶稣的最后一个问题在第三场对话中引人注目,这就是复活和末日审判的问题。阿夫季头脑中的耶稣如此回答:“复活以后再次降生的并不是我这个生命历程只剩下穿过耶路撒冷到各各他这一段距离的人,而是你们这些从基督身上、从高尚的正义中获得生命的人,你们将通过陌生的后代人到达我这里。这便是我的再次降生”。^② 忏悔救赎和复活,这是东正教的核心问题。耶稣的这段话道出了作为现代人的阿夫季对复活和救赎的理性解释——每个人道德和灵魂

^① 钦·艾特玛托夫,《断头台》,曹国维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132页。

^② 同上,第173页。

的新生、净化。这与尼·别尔嘉耶夫的复活观不乏相通之处：“人不是被基督拯救的，人是在基督里拯救的，人在得救时变成了来自基督、来自上帝的‘新造物’”。^① 复活的意义不在于年年岁岁、世世代代以复活节弥撒的形式纪念这一历史人物和事件，而是以基督的精神激活人的灵魂和良知，影响人类的生存行为和历史进程。气急败坏的毒贩曾质问阿夫季想当评判生活的“法官”，而他强调自己只是“你们中间的一员”，不同处在于自己“意识到高踞于我们之上的是良心和仁慈的最高裁判——上帝”。^② 这就是说，现代信徒不是通过体验奇迹、永生而是通过仁爱之心、敬畏之心认信耶稣基督，向善的维度成了有无信仰的分界线，这的确是摒除了宗教的神秘性和超验性的理性神学。

把耶稣的回答与一千九百五十年之后阿夫季的人生遭遇和社会观察加以对照，不可否认，神父说的是千年不变的“真理”，格里尚道出了现代社会的真相：耶稣没有复活，人类更加堕落了。于是，时代呼唤新一代的先知站出来呼告福音和宣谕启示，可以说，《断头台》这部命名特殊的小说就是“一部带有强烈警世色彩的‘末世’预言”。^③ “阿夫季”（据说是圣经中希伯来先知俄巴底亚的俄译音）和他的宗教前辈一样为消弭罪恶拯救世道赴汤蹈火九死不悔，尤其是作为群体意识极强的俄罗斯人。比如小说描写遍体鳞伤、拄着木板艰难行走的阿夫季，在火车站见到已被民警查获逮捕的毒贩，居然要求将自己也关进笼子里。那伙人却根本不承认他是“自己人”，拒绝再给他唠叨灵魂和上帝的机会。也就是说，拒绝

① [俄]引自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杨德友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第159页。

② 钦·艾特玛托夫，《断头台》，曹国维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135页。

③ 梁工主编，《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第336页。

忏悔、拒绝拯救。在物欲横流的金钱时代中不择手段为非作歹的人根本不需要基督，围猎者们甚至亲手制造出一个耶稣受难的场面寻求快活和刺激。阿夫季和当年的耶稣一样，成了被揶揄嘲弄的喜剧对象。历史的悲剧在作家笔下再次上演。

其实，阿夫季并不是全然的堂吉诃德，他有过掂量犹豫，“你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说服他们，让他们悔过自新？”“在叮当作响的金钱面前，言语是否有用？在隐蔽的恶习面前，说教是否有用？怎样用言语战胜罪恶的实惠？”“我只有一个人，……而他们，热衷于发横财的人，无穷无尽”。^① 小说的故事发展显示，制止贩毒的不是阿夫季话语中的上帝，而是法律的罗网，甚至他的爱人英加以科学方法遏止野麻生长的计划都显得更实际一些。这个人物的身上固然有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勇气，但他的行动方式就像他的受难一样，没有在人世间留下多少印痕和影响，正如学者刘亚丁所言，只是藉着“他临死前的意识和受难而死的身躯形状，把他由普通人升华为了亚基督”。^② 所以说，作家在小说中对这个圣徒式人物的刻画，思考多于颂扬：宗教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究竟应当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三

小说对阿夫季与毒贩们的活动始末进行了充分展开的“实写”，与置之于死地的围猎者的交往冲突则被处理得相对虚化了。除了作品开头被捆绑引出往事回忆之外，再就是“最后的审判”和受难。由乌合之众拼凑的围猎小组在“审判”中堂而皇之地说：“我

① 钦·艾特玛托夫，《断头台》，曹国维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91-93页。

② 刘亚丁，《苏联文学沉思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第272页。

们在这里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而你却反对计划,……可见你是个坏蛋。”^①如果说在与地下毒贩的斗争中阿夫季毫无疑问代表着正义的一方,在这里他却成了“国家和人民的敌人”,大肆破坏和毁灭生态环境的残忍行为却具有了官方代表的合法性。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围猎野生羚羊才能完成“国家任务”呢?小说第三部围绕波士顿这一人物展开的故事线索揭示了原由,至于围猎场面的野蛮、血腥、惨烈则是借助另一条线索——母狼阿克巴拉一家的视角和灾难直接呈现的。

先进牧民波士顿为人正直,勤勉工作,是小说中与理想家阿夫季相对的一个实干家。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他在体制改革之前就要求长期承包使用草地,因此屡屡受到农场党委书记的批评压制。在国家任务指标不断提高,草场过度放牧不断退化的困境中,他曾与同伴冒着生命危险试图翻越雪峰开辟新的牧场。作家通过这个人物之口评点世风:“不是因为没有人,而是因为人们不肯干活”,“现在的人,尤其是年青人,简直不知羞耻。大道理如今谁也不信,每个人首先追求个人利益”。“不劳动是无法活的啊,这也是死亡啊!”^②小说在描写他和懒惰自私、嫉妒成性的酒鬼巴扎尔拜的对比和冲突时,还表现了只说空话曲直不辨的党委书记、接受教训明哲保身的场长等基层生产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正是从国家到地方、从经济到政治、从生产到自然、从物质到精神,天灾人祸搅在一起,才出现了“像上帝一样万能的人们”动用直升飞机、汽车、速射步枪围猎野羚羊,把草原闹得天翻地覆的一幕。阿夫季对于社会犯罪问题的思考“你知道这一切是怎么产生的?原因是什

^① 钦·艾特玛托夫,《断头台》,曹国维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231页。

^② 同上,第324-325页。

么?”^① 也在这里有了旁注。

阿夫季的失败在于他并不了解这个问题重重的社会,不了解人性堕落是多方因素造成的。他对于几个年青人吸毒贩毒的地下犯罪活动无能为力,对有组织有计划地捕杀野生动物这样公开的“生产”活动就更加束手无策了。他虽然能穿越时光与耶稣感同身受休戚与共,面对人类已然状态和应然姿态的巨大沟壑却怎么也想不明白耶稣受难的意义,“难道仅仅为我们提供一个永远忏悔的理由?”“人们到底领悟了什么?得出了什么结论?”^② 这与“上帝所造世界为何有恶”的“神正论”的问题实质相似。

德国当代神学家汉斯·昆提出“在现代宗教发生了什么?而现代又通过宗教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我们作为出发点的问题。”^③ 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昭示给我们的是:在现代宗教被理性化了,理性化的宗教对于现代什么也没有发生。

304

四

汉斯·昆认为通过小说“写耶稣是不容易四平八稳和不偏不向的。小说以这一或那一方式都证明了作者的宗教。”^④ 从阿夫季的形象描写来看,可以说作家既是宗教的鼓吹者又是信仰的怀疑者,他将作为现代信仰的爱和善的品质无保留地赋予了人物,但又透过人物的基督观和无谓的惨死使这一理想人格与对弥赛亚的期许落空。在人物的高迈行为和低调意识的内在抵牾中,流露出作

① 钦·艾特玛托夫,《断头台》,曹国维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91页。

② 同上,第187-188页。

③ [德]汉斯·昆、瓦尔特·延斯,《诗与宗教》,李永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第296页。

④ [德]汉斯·昆,《论基督徒》,杨德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第160页。

家对于宗教既抱有救世的热切期望又对其现实功效持有深切的疑虑。

首先,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和理性主义者,作家在小说中借助阿夫季的言论和意识所阐发的宗教观并不带有多少宗教性。理性话语的教义界说,使宗教思维的神秘性、宗教感悟体验的直觉性、宗教情感的虔诚性等消失殆尽,几乎可以等同于社会伦理道德。这一点不少评论者有同感,“无神论的艾特玛托夫这里所指的上帝并非宗教意义上的上帝,这个上帝乃是全人类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爱,也即人道主义精神”。^①“基督教概念的内涵被艾特玛托夫改造成对至善至美境地的追求”,“‘上帝’,成为当今社会善的代表,人类道德完善的象征——这便是艾特玛托夫的新宗教,现代‘上帝’”。^②“他们往往把……耶稣基督世俗化了、道德化了,使耶稣基督成了一种象征变体。”^③

当政治说教和意识形态不再能够有效地规范社会、规约人性时,作家试图以道德至善的宗教信徒楷模唤醒社会良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把宗教实用化了,可以说是世俗宗教。他声称“作家作为公民暂且要收起‘永恒’的笔,而动手写那些迫在眉睫非做不可的事情。”^④

有此一虑,势必把超越性的彼岸天国的终极理想与实然性的此岸世界的世俗沉沦拉近,将神性象征的价值世界混同于实然判断的事实世界,以每况愈下的道德现状质疑基督的千年救赎,结果

① 严永兴,《辉煌与失落——俄罗斯文学百年》,译林出版社,2005,第308页。

② 韩捷进,《艾特玛托夫》,转引自第24页注释3,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第142-143页。

③ 何云波,《回眸苏联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第79页。

④ 韩捷进,《艾特玛托夫》,转引自第24页注释3,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第142-143页。

必然是以人类经验历史的消极困境实证性地追问神学逻辑的建构意义和中世纪文化遗产的当下存在,一如“现世的受苦成了他们反对上帝的理由”。^①这就取消了上帝和自由的关联域。因为“自由的活动出现于事实与应当的矛盾和张力状态。……如果价值存在并不与事实存在相矛盾,人的一切意愿活动没有任何事实性障碍,自由的问题根本就不会出现”。^②尼·别尔嘉耶夫指出:“解决神正论问题,不能凭藉客体化的思维,不能置于客体化的秩序中。对它的解决要放在生存的位置上”,^③“唯有在忧患重重的个体人格抗击世界秩序的痛苦挣扎中,在自由抗击必然性的痛苦挣扎中,上帝才灿然闪耀。”^④持守“自由”的基督精神的梅烈日科夫斯基的诠释是:所谓自由“并非意味着人类和个人生命问题的完满解决,而是在对复活的依赖中承负历史和生命中的恶,在生命不可解决的复杂和矛盾中坚守受难者的十字架竖立的精神高度。”^⑤故此他重申保罗之言:没有对耶稣复活的信仰,“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枉然。信仰基督根本是对耶稣复活的信仰。^⑥阿夫季这个追求自由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理想人物,最后陷入信仰危机和沮丧怀疑中,实是把本应关注个体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宗教问题纳入世界秩序、社会和谐和形而下的框架中考量,从而离开了启示的根本源头,失掉了精神的自由度。从根本上说,“上帝不是世界秩序的建构者,

① 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论梅烈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3,第214页、第216页、第186页。

② 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第333页。

③ [俄]尼·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71页、第69-70页、第69页。

④ 同上。

⑤ 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论梅烈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3,第214页、第216页、第186页。

⑥ 同上。

不是世界和谐的主人，上帝是人的生存意义”。^①

再者，阿夫季的精神悲剧与作家受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末日论观影响也有一定关系。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他不仅仅接受吉尔吉斯民族传统的影响，还受到俄罗斯文学的深刻影响”。^② 虽然艾特玛托夫是明确肯定理性的无神论者：“理性可以战胜一切。因为理性与‘善’彼此不可分，而与恶相对立”。^③ 可是，“人们一再指出，俄国的无神论本身就是宗教。……知识分子打着唯物主义的旗号，追求的却是绝对的东西”。^④ 梅烈日科夫斯基形象地描述无神论知识分子头脑与心灵的悲剧性分裂：“头脑否定上帝，心灵追求上帝”。^⑤

具体来说，阿夫季面对社会现状的理想破灭、信仰动摇，是在对一种社会发展美好前景的参照下发生的，这一社会进化论的终极设定源自基督教启示录。这在俄罗斯生活中带有普遍性，人们总是对相对的、有限的、不完美的生活现实不满，总是憧憬绝对的、完美的、无限的东西，“很快一切都将结束，末日就要来临，——这一切与其说是关于末日的思想，不如说是末日感存在于他们的每一根神经的颤动、每一次心跳之中。”^⑥ 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在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那里，启示录始终起着很大作用。在我们的思维中末日论总是占有很大的地盘，这是西方思维无法相比的。”

① [俄]尼·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71页、第69-70页、第69页。

② 魏新红，《艾特玛托夫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俄罗斯文艺》1996(6)。

③ 《艾特玛托夫答记者》，刘宪平译，《苏联文学》1986(5)。

④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国魂》，收于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第271页。

⑤ [俄]梅烈日科夫斯基，《病重的俄罗斯》，杜文娟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29页，第52-53页。

⑥ 同上。

不同于一般死亡和阴间命运的个人末日论,基督教末日论的启示是关于天国的启示,是关于基督再次降临的普遍末日论,“不仅改变个人,而且也改变社会和宇宙”;而“历史上的基督教和历史上的教会意味着天国没有到来,也意味着一种失败”。^①

基督似的人物重新面世,何尝不是一种失败?穿越时光到达耶稣那里的人亦即复活者如果只是个人而不是社会的维度,意味着世道人心依然如故。一粒麦子死了,并没有结出许多子粒。相反,十字架一方面在宗教礼仪中被庄严地再现,一方面在世俗生活中被亵渎地搬演,说明有人正在悲剧性地重蹈前辙,这对于“一起进地狱胜过被分开”^②的俄罗斯人来说,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活。十字架上的阿夫季临死前在幻觉中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想提醒并挽救救世主不要走向十字架,这难道不代表着作家的宗教迷惘?既然近两千年的人类历史已然证明耶稣与十字架的意义值得追问,还有必要再树立一个“现代基督”的楷模吗?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用来提问而不是单纯首肯的形象。作家无意于刻画一个亚基督的人物大力弘扬宗教情怀,而是自云为挽救社会尝试“通过宗教找到一条通向人的道路”。^③

作为一个不想接受生活教训的理想主义者,这个世俗的世界处处都有可能成为阿夫季的断头台;至于靠毒品自我麻醉、靠掏狼崽换钱买醉的空心人和拜金狂们,则是浑然地在为自己搭建着断头台;而置身于失去人性的人群和保留着天性的兽类之间的好人波士顿们,在种种夹击磨难中左冲右突终究难免将自己的生活和

①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第190-191页。

② [俄]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第370页。

③ 何云波,《回眸苏联文学》,第48页。

性命统统绞进了断头台；被抛弃了上帝的人类肆意祸害的草原，没有了茂盛的植物和奔跑的动物，既是狼群的断头台，早晚也会成为人类自己的断头台。“显然，小说的审判，不是宗教中的上帝对人的原罪的审判，而是人类对现世发生的恶行的审判。”^①

艾特玛托夫在文学叙事中以道德化的神学考察道德化的历史之后，由宗教怀疑和现实否定描绘出人类发展前景的悲观图景，这是必然的。不过，在这个可怕的末日景象中，现代人更要悉心去聆听另一种旷野呼告——“基督生存着，是为了那些不信仰基督的人”。^②

① 韩捷进，《艾特玛托夫》，第140页。

② [俄]尼·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第36页。